

Horwitz, S. (2019). Ludwig Lachmann as a theorist of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in Logic, Grammar and Rhetoric*, 57(1), 19-40.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作为企业家精神理论家的路德维希·拉赫曼

史蒂芬·霍维茨 (Steven Horwitz)

摘要：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强调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核心。路德维希·拉赫曼 (Ludwig Lachmann) 是一位 20 世纪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人们通常不认为他的工作对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仔细阅读他 1956 年的著作《资本及其结构》，可以梳理出一种与伊斯雷尔·柯兹纳 (Israel Kirzner) 截然不同的企业家功能理论——但仍然清晰地地位于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概念之中。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强调由之前关于拉赫曼的著作提出，但没有得到详细探讨的两点。首先，由于资本的异质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拉赫曼的企业家精神概念与从事货币计算的需求密切相关。对拉赫曼来说，企业家的关键职能是“指定” (specify) 资本财货的用途。这种指定需要使用货币价格和米塞斯所说的货币计算。第二点贡献是，就企业家创造性地指定和重新指定 (re-specify) 其资本财货的用途以响应盈亏信号的方式，提供更多的详细信息。资本财货的不断洗牌和重新洗牌（其中一部分是推出新产品或旧产品的新花样）是拉赫曼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隐含图景的本质。对于拉赫曼来说，通过以各种比柯兹纳的企业家概念更为积极的方式创建和修订计划，企业家精神与资源所有权和部署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路德维希·拉赫曼；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学派；经济计算；资本财货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强调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核心。从卡尔·门格尔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再到伊斯雷尔·柯兹纳，企业家一直是市场进程及其产生经济协调能力的主要推动者。奥地利学派关注非均衡过程和经济制度（尤其是价格体系）在使行动者更好地协调他们的预期和行动——尽管人类知识具有分散和主观的性质——方面的作用，企业家精神与这种关注息息相关。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仅是要生产什么，还要弄清楚如何使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来生产，而在奥地利学派的市场经济图景中，正是企业家承担了这一责任。

路德维希·拉赫曼是一位 20 世纪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人们通常不认为他的工作对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认为拉赫曼主要是一位关于资本和关于在一个结构不确定的世界中制度的协调作用的理论家。然而，他激进的主观主义似乎常常指向一个不那么协调的世界——人们会预期看到，企业家警觉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是否真如米塞斯和柯兹纳的作品中所说的那样普遍和强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拉赫曼更加怀疑秩序的力量能否如此明显地克服变化和不确定性的破坏性影响，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对企业家功能发表重要而实质性的意见。

仔细阅读他 1956 年的著作《资本及其结构》，可以梳理出一种与柯兹纳截然不同的企业家功能理论——但仍然清晰地处于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概念之中。Endres and Harper (2013)提供了一种这样的尝试，考察的范围不仅包括这本 1956 年的书，还包括拉赫曼作品的更广泛的语料库。我想在这里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建立在他们对拉赫曼的企业家精神方法的分析之上。在扩展他们的工作时，我想强调由他们提出，但没有得到详细探讨的两点。首先，由于资本的异质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拉赫曼的企业家精神概念与从事货币计算的需求密切相关。对拉赫曼来说，企业家的关键职能是“指定”资本财货的用途。这种指定需要使用货币价格和米塞斯所说的货币计算。出于各种原因，拉赫曼低估了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试图将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样一来，拉赫曼的企业家似乎更接近米塞斯的“企业家-推动者”概念，而不是柯兹纳的“警觉”企业家。第一点的一个含意是超越恩德雷斯和哈珀，不仅将拉赫曼和柯兹纳区分开来，而且更明确地认为，拉赫曼的企业家更接近于米塞斯的企业家。

接下来的第二个贡献是，就企业家创造性地指定和**重新指定**其资本财货的用途以响应盈亏信号的方式，提供更多的详细信息。出于我们将要探讨的原因，柯兹纳没有让企业家扮演任何角色，除了对创造利润机会的经济数据的变化保持警觉。柯兹纳式的企业家是为了解决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特定问题。在以这种方式定义企业家的角色时，柯兹纳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狭隘的企业家概念，这与拉赫曼（和米塞斯）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柯兹纳明确表示，纯粹考虑的企业家精神不需要资源所有权。相比之下，资本财货的不断洗牌和重新洗牌（其中一部分是推出新产品或旧产品的新花样）是拉赫曼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隐含图景的本质。对于拉赫曼来说，通过以各种比柯兹纳的企业家概念更为积极的方式创建和修订计划，企业家精神与资源所有权和部署联系在一起。

在下文中，我将概述米塞斯的企业家概念，以及该概念与他对货币计算的讨论的关系。在下一节中，我将对比它和柯兹纳对警觉的关注。然后我转向拉赫曼的工作，首先探讨他对企业家作为负责“指定”资本财货如何使用的人的描述。这需要回溯到拉赫曼的资本理论。在该部分中，我将说明货币计算在拉赫曼的图景中的作用。最后一节探讨了当资源所有者面临利润或损失时，这种企业家观点如何在动态市场过程中发挥作用。我将争辩说，作为计划修订过程的一部分，重新指定如何使用资本财货的后续过程是企业家功能的一项关键实践，它与拉赫曼自己理解的那种最初的企业家洞见以及对资本财货的指定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然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米塞斯论货币计算与企业家功能

从 Carl Menger (1854 [1871])的《原理》——这本书创立了该学派——开始，企业家一直在奥地利学派传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Ludwig von Mises (1966 [1949])在他的论著《人的行动》中首次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真正全面的讨论，该论文于 1949 年首次以英文出版。米塞斯的讨论在这里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原因有几个。首先，它对拉赫曼影响最大。此外，米塞斯将企业家精神置于货币

计算概念的更广泛背景下。这种背景不仅对于理解一般的企业家精神很重要，而且对于以最有成效的方式看待拉赫曼对企业家精神理论的特殊贡献很重要。

经济生产的根本挑战在于回答这两个问题，即“应该生产什么？”和“我们应该如何生产它？”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与消费者偏好有关：人们希望购买什么，或者如果他们可以购买，他们可能希望购买什么？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经常被忽视，尤其是被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忽视）是一个更难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制造这种产品，我们应该使用哪种投入组合来制造它，以便我们使用尽可能少的价值投入？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效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能够回答这两个问题，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资源，要么制造人们不想要的东西，要么以不必要的浪费方式制造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我们才能最好地回答这两个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涉及确定我们的生产方法是否正在创造价值。人们可能希望拥有很多东西，但如果我们要明智地使用资源，我们只会制造最终产品价值超过制造它们所需投入的总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将投入转化为输出，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增加而不是破坏价值。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在增加价值方面是成功还是失败？答案是我们需要某种方法来比较替代财货和替代生产过程的价值，以确定价值是增加了还是损失了，以及哪些替代过程增加最多。对于米塞斯来说，这就是他所说的“货币计算”的作用。

使我们能够进行这些价值比较的是由财货和服务与货币的交换所决定的市场价格。正如 Mises (1920) 在 20 世纪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由于市场价格而进行这些比较的能力是试图用社会主义计划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的尝试所缺少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合理使用资源，是因为它们有市场价格。它们有市场价格，因为它们有私有财产，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方面，这使得人们能够交换和形成市场，进而导致市场价格的出现。对于米塞斯（和更一般来说的奥地利学派），支持市场经济的理由是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即只有市场和市场价格使我们能够比较替代生产的可能性，并确定哪些是对资源的更合理利用。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生产过程来创造各种可能的财货和服务，但只有市场价格的存在才能让我们将这些可能性缩小到经济有效的可能性。

货币计算是资源所有者确定他们将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的过程，然后了解他们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市场价格使我们能够在我们从事经济活动之前计算出哪些选择可能是最好的。在一家企业生产一种财货或服务的上下文中，这涉及想象替代生产计划并根据每个计划制定预算。就预期成本和预期收入而言，预算必然是推测性的。但考虑到生产商对可能收入的最佳估计，它们确实能够首次尝试消除成本过高的生产过程。在没有价格和货币计算的情况下，生产商在试图从替代生产计划中进行选择时将完全处于黑暗之中。例如，如果没有价格，生产商怎么会知道，即使在技术上可以用铂金制造一些好的东西，考虑到它的成本，它也可能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在决定如何建造房屋时，生产者将如何选择砖块、木头或金属？

货币计算也与确定特定生产过程是否确实创造了价值有关。预算以前瞻性的方式使用市场价格，而盈亏则在**事后**让我们知道是否做出了一个好的选择。只有通过市场价格和使之成为可能的制度条件，才能计算出用木头建造房屋的选择是否明智。利润意味着最终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大于他们置于各项投入的价值的总和（通过利息适当考虑时间的流逝）。相比之下，损失表明最终产品的价值低于各项投入的总和，这表明生产者不应该走上这条特定的路。盈亏的货币计算为生产者提供了关于他们过去选择的智慧的事后反馈，如果没有市场价格，这些选择是无法获得的。

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所有这些都是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发生的。生产者无法确定消费者想要什么，或者他们的生产计划是否是最好的。正是通过 F. A. Hayek (1978) 后来所说的市场的“发现过程”，我们才了解消费者想要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生产它。货币计算对于米塞斯关于由“消费者主权”驱动的市场图景至关重要，该图景被理解为生产者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反应，而正是这些需求决定了谁盈利和谁亏损，以及更一般来说的资源分配模式。归根结底，谁富谁穷是消费者偏好以及生产者和工人对它们的应对有多好的结果。用市场价格计算的预算、盈亏将消费者的需求和生产者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在没有盈亏的情况下，企业家不会知道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一些企业家猜到了，他们会想要相应地调整生产的手段”（Mises 1966 [1949]: 299）。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个过程被不确定性所笼罩，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企业家的角色。挑战在于凝视一个不可知的——但并非不可想象的——未来，并努力充分利用当前资源。必须有人来负责预测未来需求并做出有关资源使用的相关决定。可以想象一种可能性是某种集体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有人来决定一条前进的道路。这种提议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机会实时尝试替代方案，我们就会限制我们发现新的更好的做事方式的能力。如果没有实际的生产，就没有办法知道一个或另一个过程是否真的是最好的决定。把这留给一组人之手，似乎有着不必要的风险。这样一个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可能产生良好的结果，且任何特定失败的风险最小：在系统中，有多个行动者尝试替代生产过程，并且这些行动者被告知他们的过程如何运作并被提供修复它们的激励。这种所有权的分散（哈耶克用“若干财产”这种说法来反映这一事实，即财产不仅是私有的而且是分散的）使构成企业家精神的生产实验成为可能。由于多个行动者能够尝试各种不同的选择，无论是在生产之前通过预算过程还是随后在实际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家不仅有着超越其竞争者的激励，而且也会收到关于他们做得如何的盈亏反馈。

对米塞斯来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驱动力”（1966 [1949]: 299）。企业家的任务是预期消费者的需求，并将资源整合在一起，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满足这些需求。归根结底，决定企业家是否做对的是消费者，而消费者满意度的指标是盈亏。利润将更多资源的控制权交给那些预期更正确的人，而损失则将资源从错误的人手中夺走。企业家不断努力为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好的服务，因为消费者掌握着让企业家富裕或破产的权力。企业家承担这些风险，市场价格为他们提供了展望未来和总结过去行动所需的指导。

如果米塞斯对企业家的描述存在弱点，那就是考虑到米塞斯对消费者主权的强调，他有时将企业家描绘成有些被动。在我们专注于收入侧的程度上，企业家的命运确实受制于消费者的选择。然而，企业家必须判断使用哪种投入组合来生产他们认为消费者想要的任何东西。毫无疑问，这些投入的价格是消费者如何评估他们面前的所有各种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消除参与生产过程决策的判断行为。Mises (1966 [1949]: 290–1) 认为“特定的企业家功能在于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伊斯雷尔·柯兹纳的企业家更加被动，因为对于柯兹纳来说，企业家的主要职能是对已经发生的变化保持警觉。相比之下，拉赫曼对企业家精神的隐含图景要主动得多，也更接近米塞斯的观点。

柯兹纳论企业家警觉

伊斯雷尔·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理论首先在他 1973 年出版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得到了充分阐述。该书是对奥地利学派重新产生兴趣——这种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并在此后不断增长——的关键催化剂。这本书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详细阐述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的独特理解时，柯兹纳将他的理论置于了当时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背景中。完全竞争的标准模型假设每个卖家都是“价格接受者”，无法单方面改变价格。卖家将“市场”确定的价格视为既定价格。理解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该模型还假设了大量非常小的卖家，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对整体市场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当然，经济学家在分析整个市场时，他们仍然谈到价格的变化是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柯兹纳本质上问的是“如果每个卖家都将价格视为既定价格，那么市场层面的价格究竟会如何变化？”标准模型中的答案是一位假想的“拍卖师”这种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他会向买卖双方喊价，直到找到均衡价格。虽然这个装置对于维持先前关于企业规模 and 价格接受行为的假设是必要的，并使理论在数学上易于处理，但作为理解现实世界市场的一种方式，它显然是有问题的。

柯兹纳对“谁改变了价格”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企业家。理解完全竞争均衡如何实现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企业家行动——在现有的非均衡中看到了通过生产重组获利的机会。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写的（Horwitz 2004），另一种看待柯兹纳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的方式是“对哈耶克问题的米塞斯式答案”。Hayek (1948 [1937]) 在他 1937 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指出，市场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行动者的预期变得越来越相互协调。当每个行动者对外部世界的预期和其他行动者的预期都正确时，这种“计划的吻合”在均衡中变得完全，使每个人都能毫无失望地执行他们的计划。哈耶克在那篇文章中没有完全回答的是那些预期和计划相互协调的精确过程。柯兹纳以米塞斯的企业家概念为基础来解释企业家是如何做到的。

柯兹纳的关键在于区分他所说的“罗宾斯最大化”和企业家精神。罗宾斯最大化以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勋爵的名字命名，他的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Robbins 1932）将经济学定义为在竞争的目的之间分配稀缺的手段。该定义使经济学成为最大化资源有效分配的静态问题。特别是，它把手段和目的都视为给定的，并询问如何最好地在这些目的之间分配这

些手段。正如柯兹纳所指出的，有了这个定义，就没有真正的由生产者做出的“选择”。例如，如果假设它们的利润最大化，则给定数据暗示了它们的最佳生产点。他们不会“选择”他们的产出和价格水平，他们只是“弹出”给定给他们的数据。如果一个人假设定义均衡是目标，这种方法可能对计算这些产出和价格水平有用，但它对于理解经济如何演变和变化的用处不大。

柯兹纳感兴趣的是人如何在非均衡中进行选择，从而推动经济朝着哈耶克所讨论的完全协调均衡（full coordination equilibria）发展。在一个非均衡的世界中，计划没有完全协调，一些行动者能够认识到这种不协调并想出纠正它的方法。对于柯兹纳来说，通过纠正现有的不协调来识别获利机会的能力就是他所说的“企业家警觉”。企业家所做的就是转变“给定的”手段-目的框架，警觉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资源的替代用途。企业家要么注意到消费者偏好的改变，要么注意到各种资源的成本的变化，并识别到其中任何一个都会改变给定的手段-目的框架，使得旧数据不再意味着最佳结果。对柯兹纳来说，该识别的时刻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时刻。一旦那个时刻过去，并且一个不同的手段-目的框架就位，行动就将和新框架一起回到罗宾斯最大化。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对新信息的警觉并了解如何将其整合到经济现实的新图景中。

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的典型例子是纯粹的套利。如果苹果在街道一侧的售价为每磅 2 美元，而在另一侧的售价为每磅 4 美元，那么买卖双方的计划就会不协调，因为双方都错失了做得更好的机会。走在街上对这种不协调的可能性保持警觉的人，更有可能发现它并能够利用它。价格差异的识别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时刻。从那里开始，执行这样的行动，即在一侧为一磅苹果支付超过 2 美元的价格，而在街道另一侧以低于 4 美元的价格提供它，是一个最大化的问题。然而，认识到手段-目的框架可能与以前不同，这是企业家洞见的时刻。请注意，现在正是企业家精神导致街道两侧的非均衡价格更接近均衡。市场价格的变化是因为企业家没有把价格当作既定的，而是利用了非均衡带来的获利机会。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企业家也激活了哈耶克所描述的社会学习过程：2 美元苹果的卖家知道他们可以从他们的苹果中得到更多，而 4 美元苹果的买家知道他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各组错误的预期得到纠正，彼此之间更加协调。企业家精神是纠正预期错误和推动市场走向更全面协调的方式。

即使我们远离纯粹套利的例子，这种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重要的。大量的企业家活动采取将一组投入转化为价值更高的产出的形式。人们可以将此描述为一种“跨时间套利”（arbitrage over time）的形式。看到一堆木头、一把锯子、一把锤子和一袋钉子，并认为“我可以把它们变成一个梯子”的人，是在从事一种跨期套利。这也是一个企业家警觉的时刻，即识别出一个非均衡，在该非均衡中预期是不完全协调的。事实上，假设人们对一个完整的梯子的评价高于各项投入的总和（以利息的形式考虑时间的流逝），在这些投入中看到一个梯子的可能性的企业家就有了一个正确的企业家洞见。一旦企业家以这种方式调整了手段-目的框架，他就可以执行建造一个梯子的计划，并发现他的企业家洞见是否是一个好的洞见。对于柯兹纳来说，与米塞斯一样，盈亏的作用是告知企业家他们的行动是创造了价值还是破坏了价值。

柯兹纳的贡献的重要性是巨大的，无论是就其对增强企业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的长期影响而言，还是特别地为奥地利学派的复兴铺平道路而言。然而，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旨在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将价格视为给定，那么市场价格为何会发生变化？”）并给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答案（“通过对非均衡中套利机会的警觉”）。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包含有企业家的角色在内的成熟的企业理论。柯兹纳非常符合米塞斯的精神，强调企业家精神是所有行为的一个要素，其形式是对新机会的警觉性，并重新构想手段-目的框架。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这样做，而不仅仅是以更狭义的“经济”活动的形式。例如，当我们意识到有一条更短的路可以到达我们喜欢的新餐厅时，我们就具有企业家的精神。正如米塞斯和柯兹纳所言，人的行动的这一要素对于理解市场过程至关重要。但它并没有足够多地告诉我们实际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如何应对它们所经营的市场的持续演变。

柯兹纳明确指出，企业家精神不需要资源所有权。如前所述，企业家时刻是对手段-目的框架已经改变的识别。之后发生的事情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而是服从于罗宾斯最大化过程的管理。我们的苹果套利者不需要任何资源来识别街道为他提供的获利机会。一旦他看到这一点，给定了新的手段-目的框架，这就是一个优化行为的问题。在纯套利的背景下，即使是过程中的那一步也不需要资源，因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企业家可以借钱购买苹果并用利润偿还贷款。当我们通过时间比较生产案例时，这里同样可以使用贷款来购买相关投入。但是，必须有人决定购买哪些投入以及如何准确部署它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人决定，在知道企业的盈亏之后如何修改计划并进行下一轮。对于米塞斯来说，这项工作是企业家的“确定生产要素的使用”的工作。¹尽管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概念解决了标准经济理论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但它对于描述企业（尤其是被理解为各项投入的所有权的集合）在现实世界市场中的行为方式的作用尚不清楚。米塞斯的更广义的企业家概念（即对生产要素使用的控制）似乎更适合这项任务，特别是与米塞斯对货币计算在该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强调相结合时。有助于充实米塞斯的企业家概念的是关于“使用生产要素”所涉及的更多细节。正是在那里，路德维希·拉赫曼的工作最有帮助。

企业家精神、企业和资本财货的指定

路德维希·拉赫曼很少专门写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他隐含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可以从他关于资本理论的著作（尤其是在他 1956 年的著作《资本及其结构》）中看出。拉赫曼在那本书中的任务是探索“资本的秩序”问题。他想解释特定的资本财货群如何随着经济过程的展开而形成和变化。他研究资本的核心是资本异质性的概念。几乎每一种资本财货都可以用于大于但小于无穷的若干目的。资本财货具有“多重专用性”（multiple specificity）。也就是说，它们可以用于某些有限数量的目的，每个目的具有不同程度的生产力。这种说法的一个含义是，如果我们希望将资本财货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可能会有“重新装配”成本。即使资本有多种用途，也不是所有的用途都

¹ 当然，Mises (1966 [1949]: 291)很快补充道：“但他不能逃避市场规律。只有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服务，他才能成功。他的利润取决于消费者的认可。”

可以在准确的当前条件下被资本使用。这种使用上的异质性既适用于单个资本财货，也适用于构成资本存量的整个财货范围。任何单一财货都有多种用途（尽管不是无限用途），经济中所有资本财货的可能用途以多种方式重叠。

正如米塞斯也观察到的，如果资本财货只有一种用途，那么资本的结构就不会带来太多的解释性问题，因为不会有关于如何分配特定资本的决定。类似地，如果所有资本财货都可以用于**任何**目的，那么解释资本的结构就不会那么复杂了，因为这只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即需要使用多少资本总额来生产消费者想要的任何东西。²现实世界中资本所带来的挑战是，任何特定的产出通常都可以通过各种投入组合产生，而任何给定的投入都可以用来帮助产生各种不同的产出。资本财货的所有者必须决定他们希望生产什么，以及哪种资本财货的组合最适合实现这一目标。

Lachmann (1978 [1956]: 8)将“计划”的概念置于其资本理论的中心：“资本使用必须‘相互配合’。每种资本财货都具有一种功能，它构成了计划的一部分。”他（1978 [1956]: 35, 强调为原文）后来扩展了这些评论：“因此，资本理论必须关注企业家在其计划中构造异质资本资源组合的方式，以及当他们修改这些计划时，他们重组它们的方式。”这句话包含了拉赫曼资本理论的精髓和企业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生产需要基于资本财货组合的计划，作为企业家意味着负责创建和修改这些资本组合，并有权使用构成它们的资本财货。

除了对现有资本财货的使用做出决定外，企业家还必须“指定并决定资本资源应具有的具体形式”（1978 [1956]: 16）。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家至少负责（从经济意义上，如果不是从物理意义上的话）**创建**他的一些资本财货，从而根据他对生产计划的图景赋予它们所需的特定品质。通过各种合同安排，这些资本财货的所有者“将指定的权力授予了企业家”，使这些所有者承担了重大的不确定性（Lachmann 1978 [1956]: 17）。如果在对这些资本财货的特定指定的好处上，企业家是错误的，那么一些损失将由所有者承担，而不仅仅是由企业家承担。回想一下，为新用途重新装配资本财货是有成本的，如果企业家的总体计划失败，所有者将承担这些成本。

在构建这个生产计划并指定它所需的资本财货时，企业家必须关注这些财货的**互补性**。制定一个生产计划的意义是将一系列“相互配合”的资本财货汇集在一起，以使人们相信它们能够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所需的产出。“配合”的概念就是拉赫曼所说的资本财货的“互补性”。正如他所指出的，互补性是该计划所体现的静态世界的一个特征。它是计划执行期开始时，在计划的快照中资本财货的属性。Lachmann (1977 [1947]: 200, 强调为原文) 谈到互补性：

所有用于联合完成同一目的（或同一类目的）的手段必然是互补的。换言之，要素的互补性需要置于计划的框架下考虑，在该框架内每个要素都具备一定的功能。因此，只有针对一项给定的计划，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谈论要素互补性。

² 当然，这本质上是弗兰克·奈特的资本理论。参见 Hayek (1936)的奥地利学派回应。

此外，互补性是基于制定计划的企业家的看法。Lachmann (1978 [1956]: 3) 是这样说的：

“最佳”的互补模式不是一个“基据”。它不是“给定”给企业家的，相反，他们通常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找出它是什么。即使他迅速取得了成功，他也无法长久地享受这个成果，因为环境迟早会再次发生变化。

Lachmann (1978 [1956]: 54)后来称之为“计划互补性”，以区别于整个资本结构的“结构互补性”。正如他所指出的，前者是“由企业家行动**直接**带来的”，而后者是“由市场（即大多数不一致的企业家计划的相互作用）**间接**带来的。”

企业家根据他们对投入互补性的感知来制定生产计划，以产生所需的产出。从他们的每个角度来看，他们都制定了“最佳”生产计划。每个单独的计划都是内部一致的。问题是他们的每个计划是否**彼此一致**。如果两个企业家都计划在他们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相同的资源，那么只有一个会成功。正是在这些计划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中，我们才发现，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看，这些原始计划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对资源的最佳利用。Lachmann (1978 [1956]: 23)谈到商人的预期时说，他“正在做科学家在提出一个可行的假设时所做的事情”。这些预期体现在生产计划的互补性上，企业家只有通过对市场上的“假设”进行检验，才能发现他们的预期和计划是否正确。随着他们每个人都根据市场测试的结果进行调整（下一节将详细介绍），他们重新制定了这些计划，并且很可能产生整个资本结构的间接结构互补性。如果每个企业家的生产计划都可以按原样执行（即内部一致并与其他企业家的计划一致），那么资本的整体结构将是互补的。当然，在数据不断变化的动态世界中，完美的结构互补性永远不会出现，但与其他均衡结构一样，它可以作为现实世界动态变化的陪衬。

拉赫曼在这里的论证再次让人回想起前面提到的哈耶克（1937）的《经济学与知识》论文。哈耶克在那里将他的论点构建为关于个体均衡和整体均衡之间的区别。哈耶克的个体均衡是由行动者的主观评价协调的。这样一来，它就类似于拉赫曼的“计划”。行动者检查他们可以支配的资源，并根据他们对各种资源（在效用或潜在盈利能力方面）的价值的看法来制定消费或生产计划。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市场价格的帮助，但最终的评价是根据行动者的判断。正是他的感知将这些元素整合到了一个计划中，或者将这些元素带入了彼此之间的均衡关系。相比之下，哈耶克的整体经济均衡发生在这些人的所有计划都可以成功执行时。具体而言，这些个人计划必须包含对世界客观事实和计划的正确预期，因此也包含其他行动者的主观预期。哈耶克的整体均衡对应于拉赫曼所说的资本整体秩序的结构互补性。

两位思想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从可能发生冲突的个人计划中获得一个让这些计划日益协调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从整体非均衡中的个体均衡变为整体均衡？对于哈耶克和拉赫曼来说，市场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市场，个

人了解他们计划的成功和失败，并以促进更好的计划协调的方式调整这些计划。特别是，通过价格变化，以及它们引起的盈亏变化，行动者了解他们的计划是否成功，以及这些计划与其他行动者的计划是否一致。这些市场过程推动经济从最初的个人主观认知非均衡走向整体均衡，并从主观上互补但客观上互相冲突的企业家计划中引发资本结构的结构性互补。

正是在这里，拉赫曼隐含的企业家理论的米塞斯风格浮出水面。尽管拉赫曼几乎没有以明确的方式关注它，但他的企业家精神理论的一个核心方面是货币计算，这是米塞斯工作的核心。在创建作为其生产计划核心的资本互补结构时，企业家必须参与预算、生产和基于盈亏的计划重新制定的循环。这个循环需要使用货币价格和货币计算。正如米塞斯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决定他将在这一特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众多可能的投入组合中的哪一种时，企业家必须求助于市场价格。然后可以将这些替代计划转化为生产过程的预算。除了企业家对收入的最佳估计，它们本身需要以货币计算的市场价格，这些替代预算允许企业家决定哪些计划看起来最有利可图。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各种技术上可行的生产可能性中选择经济上最有效的一种。拉赫曼的企业家在制定以资本互补为特征的生产计划时所做的正是从事这项任务。³

货币价格和货币计算使企业家能够指定对生产所讨论的产出最经济有效的资本财货的精确组合。企业家精神当然包括通过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来警觉消除无知的机会。但是，柯兹纳式的洞见的时刻只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其中包括对确切需要生产什么以及最佳生产方式的大量**判断**。不清楚的是，一旦由于警觉而使手段-目的框架发生了变化，企业家的其余工作是否是一个相当静态的最大化问题。除非在企业家从头到尾构建生产计划的整个过程中建立“警觉”，否则在整个过程中仍然存在企业家判断的要素。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其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都要求企业家对哪种投入组合最好做出判断。更重要的是，投入的互补性并不是财货本身固有的，而是企业家的主观感知。什么构成了适当互补的资本财货集，显然不能解释为最大化问题。

当我们回忆起预期在拉赫曼资本理论中的中心地位时，这些观点变得更加清晰。他（1978 [1956]: 20-21，强调为原文）写道：“另一方面，预期总是**使存有疑义的、需要被解读**的经验得以具体化……在我们的心智的行动中，存在着主观元素，我们通过它来选择经验中的一些部分来影响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如果没有运用货币计算的企业家预期，就不可能根据对该计划的投入的互补性来制定预算和生产计划。这些预期必然依赖于这些企业家的主观解释，从而使人高度怀疑柯兹纳式的故事，即一个警觉的时刻，然后是罗宾斯最大化。作为对价格如何变化的解释，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是成功的。但是，它没有提供这一过程的完整理论：从警觉的时刻，到产出的生产，以及随后的盈亏反馈和计划修订。

³ 限于篇幅，我不能详细探讨这一点，但几乎所有关于企业家和资本投入之间关系的内容都适用于劳动力。当然，最重要的区别是工人不能被拥有，只能出售他们的劳动力。然而，这一点对于理解企业家如何指定投入并利用资源互补性来构建生产计划并不重要。

将拉赫曼关于资本的工作与米塞斯关于货币计算的工作相结合，使我们能够勾勒出比柯兹纳更完整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当我们继续这个故事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差异，而不仅仅是资本财货和生产计划的初始指定。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有一个更充分的动态元素，它赋予企业家一个重要的和积极的角色，以响应执行最初的生产计划的结果。在最后一部分，我探讨了拉赫曼关于资本“可替代性”的讨论，强调企业家必须通过解释市场盈亏数据来“重新指定”资本财货并重新构思他们的生产计划。

资本的重新指定作为一种企业家功能

在迄今为止的讨论中，我把拉赫曼所说的资本互补性强调为企业家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互补性使企业家能够形成他们认为一致的生产计划。

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补性是计划形成的个体均衡的静态世界的一个特征。然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除非所有这些单独的计划完全完美地吻合，使我们处于经济范围内的均衡状态，否则其中一些（如果不是很多的话）注定会失败。企业家通过市场的盈亏信号来发现他们计划的成败。面对亏损，或者利润低于预期，他们将不得不决定如何应对。该反应的一个重要部分将是重新考虑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的生产计划。重新考虑该计划将涉及重新考虑用于创建它的资本。

面对盈亏信号带来的变革需求，企业家必须将关注点从资本的互补性转向资本的可替代性。由于他们的计划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企业家将不得不决定在他们前进的过程中需要改变什么。问题将是替代资本财货和人力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先前计划中的那些。考虑一个持续亏本的餐馆老板。她没有足够的人手吗？还是人手太多？前厅后厨的比例不合适吗？她的食材不够新鲜吗？餐桌设置不对吗？她应该提供外卖吗？有几十个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无论答案是什么，它们几乎肯定需要用新的资本财货和人力资本来代替旧的。正如 Lachmann (1977 [1947]: 200) 所说：“只要要素适合生产计划并参与生产过程，它们就是互补品。另一方面，替代是一种改变的现象，每当先前的计划出现问题时，就会出现这种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的资本财货的特征之一是它们对其他资本财货的替代程度。我们可以将一种要素的“可替代性”定义为“【它】可以转变为现有计划的一个元素的容易程度”（Lachmann 1977 [1947]: 200）。企业家在决定下一个时期需要对其生产计划进行哪些改变时，必须考虑特定资本财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足够的通用性，（用拉赫曼的话来说）可以整合到他试图执行的更大规模的计划中（例如，经营一家盈利的餐厅）。这种多功能性的概念只是看待资本财货的专用性的另一种方式。通用性较强的财货专用性较弱，而通用性较弱的财货则专用性较强。当拉赫曼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谈到资本的“多重专用性”时，他们指的是其多功能性的程度。

用我们之前的语言来说，盈亏信号迫使企业家在修改生产计划的过程中“重新指定”资本财货。具有足够多功能性以整合到修订的生产计划中的财货必须针对特定的资源组合指定其特定用途。这是一种“重新指定”，因为该财货可能被用于其他一些生产计划，或者可能处于闲置状态，其中任何一种都需要对其在新计划中的角色进行调整。可以考虑新员工必须接受新工作或新职责培训的方式，或者为新业务购买计算机时可能需要新软件，作为重新规范的示例。这些财货和人力资本可能已经被考察中的企业使用，或者可能从外部购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将是这些新投入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替代正在修订的计划版本中的投入。

值得强调的是，企业家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所特有的意想不到的变化所必需的。在一个未来不可知但并非不可想象的世界里，每一个生产计划都不过是一个希望。这些计划在市场上的冲突将产生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结果，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许多计划将无法实现其创建者的预期。

Lachmann (1978 [1956: 13])指出，这种背景赋予了企业家精神以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世界中；因此，资本组合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结构将不断变化、解散和重组。在这种活动中，我们发现了企业家的真正作用。

或者，正如他 (1977 [1947]: 212) 在别处所说，呼应米塞斯：“修订计划是企业家的职责，执行现有计划是经理的职责。”对于拉赫曼来说，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不仅仅是对机会保持警觉，然后制定由互补资本组成的生产计划。它至少具有“解散和重组”资本组合以应对盈亏的能力，并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这样做。正是这种对资本财货的指定和重新指定，是定义企业家真正职能的计划修订的一部分。

一种特殊的资产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在 Lachmann (1978 [1956: 87]) 的资本理论中，“货币是一种资产，但它不像生产计划的其他要素那样是一种资本财货。”后来他将货币称为“代理的资本财货”（87）。他的意思是，企业家从一开始就持有现金余额作为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并认识到随着计划的展开，在特定时刻购买各种资本财货需要现金。由于这些财货一开始无法购买和储存，我们将持有的现金余额纳入计划中，作为他们最终将采购的资本财货或劳务服务的替代品。这种现金余额的使用是 Lachman (90)所说的“二线资产”。一线资产是从一开始就进入生产计划的实际资本财货。二线资产是企业家计划在生产过程后期使用的资产，例如备件或用于支付工资的现金。这种使用货币的关键在于它是与生产相关的计划支出的一部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些支出不能在生产过程的一开始就进行，因此要求我们同时持有现金。

拉赫曼所说的“储备资产”是那些“希望如果一切顺利，它们根本不必投入”的资产（90）。储备资产，尤其是储备现金，与二线资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没有计划使用，但如果发生不可预测的事件需要使用它们，它们就会存在。可以想象一家企业有一台备用机器，以防万一工作版本出现不可预知的灾

难性故障。与需要备件的部件的可预测磨损不同，这更像是一种针对不确定未来的保险形式。但请注意这种储备资产的特殊性（即缺乏多功能性）——它只能替代一种特定的投入。相比之下，现金储备在面对一些意外事件时购买其他资产的能力几乎完全通用。在拉赫曼看来，企业持有现金，可以在时间需要时可用于转换为资本财货或劳务服务，并且可以作为一种完全通用的资本替代品，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可以将其转换为特定的财货或劳务服务。

这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企业现金余额的变化是成功或失败的指标。正如 Lachmann (90) 所说：“成功意味着不必投入储备，极端失败意味着储备完全耗尽。”遭受损失意味着看到现金储备减少，因为收入没有达到计划中的预期水平，或者成本超过了他们的水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结果中的任何一个都代表计划失败，并且在我们与损失相关联的现金余额变化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失败。当然，利润将反映在这些现金余额的增加中，因为该计划或多或少如预期或好于预期。关于现金储备的这一点也清楚地表明了货币计算在理解企业家精神中的重要性。以与现金储备和盈亏相同的货币形式计算的市场价格，整合了为计划制定预算、执行计划、了解其成功或失败，然后进行相应修改的能力。没有货币价格和货币计算的整个过程，企业家就无法完成他们的工作。

现金余额（也许还有其他储备资产）的这些变化反映了盈亏是**剩余**的意义。它们是赚取收入和支付成本后剩下的东西。企业的所有者通常被称为**剩余索取者**，因为他们是保留利润或对损失负责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定和重新指定资本财货和人力资本的权利，以及保留与这些投入相关的生产过程的收益的权利（或承担损失的义务）界定了企业的边界。所有权和企业边界问题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企业家（和更一般的企业）是那些能够决定哪种投入组合将构成生产计划，保留利润或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然后有权在下一个时期改变该计划的人。企业是制定、评估和修订计划的单位：“现在很清楚，为什么同一企业联合使用的要素往往是互补的：它们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手段，是同一计划的元素。在此，管理的一致性确保了行动的一致性”（Lachmann 1977 [1947]: 201-2）。拉赫曼的资本理论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企业家在做什么，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隐含的企业理论。

结论

拉赫曼的资本理论中发现了企业家精神理论，也许还有一个萌芽中的企业理论，这并不奇怪。拉赫曼将企业家视为在使用盈亏信号修正生产计划的情况下，资本货物（和人力资本）的使用的积极指定者和重新指定者，这使他更接近于米塞斯的企业家概念，而不是柯兹纳的更狭窄的概念。随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继续明确企业家的角色是什么，以及它如何更广泛地适应经济理论，他们不应该忽视拉赫曼在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明确地谈到了资本，拉赫曼的《资本及其结构》以及他的相关文章，提供了一种企业家理论，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经验应用和与刚刚开始探索的企业理论的联系。

参考文献

Endres, Anthony and David Harper. 2013. “‘Wresting Meaning from the Market’: A Reassessment of Ludwig Lachmann’s Entrepreneur,”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9: 303–28.

Hayek, F. A. 1936.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0 (2): 199–228.

Hayek, F. A. 1937.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33–56.

Hayek, F. A. 1978.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olitics,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rwitz, Steven. 2004. “Monetary Calculation and the Unintended Extended Order: The Misesian Microfoundations of the Hayekian Great Society,”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7: 307–21.

Kirzner, Israel.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chmann, Ludwig M. 1977 [1947]. “Complementarity and Substitution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reprinted in Walter Grinder, ed.,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7.

Lachmann, Ludwig M. 1978 [1956].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Menger, Carl. 1981 [187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ises, Ludwig von. 1920.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F. A. Hayek, ed., Clifton, NJ: Augustus M. Kelley, 1935.

Mises, Ludwig von. 1966 [1949].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Chicago: Henry Regnery.

Robbins, Lionel. 1932.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